

编读札记

写与评的理念和实践

姚松柳 著



新华出版社

自序

出这本书的想法是在几年前。2003年7月，正当我在为自己作“嫁衣裳”进行初步策划，并为此开始整理各类文稿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让开始的“嫁衣裳”制作一下子中断了两年。2005年的夏天，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也能正常上班了。于是，工作之余又让两年前的开始得以继续。不过，毕竟生过一场大病，又是带着病走到知天命之年，体力精力远不如从前，因此只好放慢工了。这慢工未必出得了细活儿，但确给了我一定的时间，增加了一些新写的文章。

这本书的内容分成三辑，每辑都写了一个“本辑前言”，主要介绍这一辑的编写思想和内容。三辑内容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一条写作的主线将其贯穿起来。

我在一本叫做《三叶集》的书中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

“Kleeblatt，拉丁文作 Trifolium，系一种三叶矗生的植物，普通用为三人友情的结合之象征。我们三人的友情，便由这部 Kleeblatt 结合了。”^①如果借用这段话中的“Kleeblatt”这个词作比喻的话，也可以说这本书的三辑内容由写作“Kleeblatt”结合了。

在近二十年的图书编辑工作中，自己深刻体会到写作的重要性。因为，作为语言文字能力一部分的写作是“编辑的主要工具或者说第一武器……要把编辑工作做好，必须首先把这个无形的工具磨练好。”“在编辑工作过程中，从审稿改稿，写审读报告，出版说明，内容提要，图书评介，和作者通信联

^① 见宗白华著译精品选《三叶集》的“田序”。“田序”，即田汉（字寿昌）作的序言。“我们三人的友情”系指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人。《三叶集》一书由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系等等，无不需要使用语文工具。甚至写一两句的内部通知单都大有学问。”^①

1984年7月，教育部在写给中央的《关于高校筹办编辑学科专业的报告》中提到培养编辑人才时，就强调编辑要“有比较扎实的语言文字和写作的基本功”。实行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以来，考试的辅导教材《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也将语言文字能力作为图书编辑的七大能力之一，包括三个方面：规范能力、加工能力和写作能力。指出：“凡是写作能力强的编辑，往往审读、加工也能独具慧眼，妙笔生花，哪怕只是一字一词的改动，也能改得恰到好处，仿佛与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否则，就容易在加工过程中发生种种‘硬伤’，甚至闹出以错改正的笑话。”因此“我们一定要提倡、鼓励编辑写作，或者有自己的著译，这样不但可以提高编辑自身的鉴别、欣赏能力，而且在取得创作的经验和体会以后，可以在编辑工作中更好地帮助作者和读者。”^②

当然，做好编辑工作不仅仅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还要不断加强中文理论素养。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和素养，实践能力才会不断加强和提升。借此，我想谈谈自己在从事图书编辑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学习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什么是图书编辑的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或者说，图书编辑的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究竟是由哪些学科构成的？探讨这个问题对于指导图书编辑专业技术工作，加强图书编辑能力建设、培养图书编辑人才等，都有重要意义。当然，这里没法展开讲，仅此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从图书编辑专业技术工作实务来看，语言文学理论与知识应当成为图书编辑（也包括其他行业的编辑）的专业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图书编辑的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有四方面：编辑出版专业理论与知识、语言文学专业理论与知识、出书专业分工所属的学科专业理论与知识、本科或研究生专业理论与知识。

编辑出版专业理论与知识，语言文学专业理论与知识，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专业理论与知识，这三者构成图书编辑的专业基础理论与知识。

编辑出版专业理论与知识，语言文学专业理论与知识，出书专业分工所

^① 人民出版社编审林蕙芳《编辑的语文学习和进修》，见《编辑工作二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② 原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吴道弘《认真探索编辑工作的规律》，见《编辑工作二十讲》，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属的专业学科理论与知识，这三者构成图书编辑的专业理论与知识。

编辑的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与知识，就像两个交叉的等腰三角形，构建起图书编辑智力密集型劳动的专业技术能力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语言文字包括写作，是贯穿在图书编辑专业技术工作中最有应用价值、最具操作性和基本功的专业与专业基础理论与知识。因此，专家学者强调语言文字包括写作是编辑的主要工具和第一武器；强调要磨练好这个主要工具和第一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拙作不仅是自己结合图书编辑工作实际读书、学习的一些收获，也是自己在图书编辑工作实践中，通过将书评、随评、随笔“Kleeblatt”的写作，不断磨练语言文字过程的记录。从这个记录中可以看到自己做为一个图书编辑杂与专，博与精的职业生命体验；同时，也反映了自己对图书编辑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构成的理念与实践，因此，我给这个记录起了一个“编读札记”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图书编辑读书写作的手记。其中，难免有错误的认识，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9年5月

第一辑 图书评论

本辑前言

这一辑选收了自己多年来撰写的部分图书评论，加上第一篇关于书评理论方面的随笔，总共 21 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发表过的，这次选收时都作了适当修改。有的根据原稿，还恢复了发表时由于报刊版面字数所限而被删去的内容。同时对被评图书的作者、书名、出版者和出版时间作了脚注。

根据被评图书的出版者，将这辑中的书评大致分成以下三类：

第一类（2—9 篇和 20 篇），被评图书都是由我组稿、责编，由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第二类（10—12 篇），被评图书不是由我组稿与责编的，但都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第三类（13—19 篇和 21 篇），被评图书都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

以上三类中的各篇书评均按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另外，第 20 篇属于第一类，本来应该放在前面，但是，因为这篇书评与第 21 篇书评不仅内容涉及的都是基础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一同引出了被评图书背后的“故事”，所以作了特殊安排，放在了后面。另外，从第 15 至 19 篇，所评图书都是文学类书籍，尽管第 18 和 19 篇还分别发表在文学刊物和学术杂志上，但是这几篇都是图书评论，不是文学评论。因为他们评论的都是书，而不是将这些书作为材料去研究或探讨某个文学理论问题。

图书评论是图书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图书宣传的多种方式、方法

中，图书评论对图书内容和特点的分析和评价更深刻、更全面，是图书宣传最重要的方式。图书评论还是出版工作的延续，使出版活动的深度和广度近一步扩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图书评论还是编辑工作的职责和延续。多年来，不少学者和一些论著都认为，图书评论是除了编辑、复制（印刷）、发行以外的出版工作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他与编、印、发共同构成了出版活动，是出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图书评论学、编辑学、印刷学、发行学共同成为出版科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图书评论在出版工作和出版科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图书评论还与语言文学密不可分。书评的写作，离开文学手法的运用，不管是文学类图书的书评，还是学术书评，都会失去生动和形象，失去了美。现在很多书评的文本和语言形式越来越文学化，文章越来越追求美。从上述意义上讲，学习和练习书评写作，对于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加强专业和专业基础理论的学习，磨练语言文字，培养写作能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每一本新书的出版，其责任编辑都是他的第一读者，而且不是一般的第一读者，是塑造和“分娩”这本新书的第一读者，因此，编辑对他的作品“孩子”最有发言权。从这一点来看，图书编辑应当肩负起义不容辞的书评职责，为出版科学及其基础理论的建设，为向读者推荐并引导大众阅读和欣赏好书，为积累和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推进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发挥书评的宣传功效

题记：《新华文摘》1998年第8期摘要刊登了此文的主要观点：“姚松柳在1998年5月20日《新闻出版报》撰文指出，书评具有图书本身所无法取代的宣传、导读、批评、创造性、价值取向以及对编辑出版工作继续延伸等特殊功能。其中，宣传功能是贯穿于书评中最主要、最基本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文化领域里热点图书的不断涌现，带动起图书评论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入的层次中迅速开展起来。数量相当多，质量比较高的书评让人目不暇接，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读书、生活方面的杂文、小品等，一道构成了许多报刊版面中靓丽的文化景观。

图书评论是对图书主要内容的综合议论与介绍；是对图书的思想、理论、学术观点、写作情况和编辑出版意图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与理解；是在发掘和提炼图书内涵基础上进行的论文创作；是对图书可持续发挥效益的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是对图书采取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宣传方式。因此，书评具有图书本身所无法替代的宣传、导读、批评、创造性、价值取向，以及对编辑出版工作继续延伸的特殊功能。其中，书评的宣传功能是书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其他功能大体上都是通过书评的宣传功能体现出来的。

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书评的宣传功能呢？我认为应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书评不仅是沟通读者与图书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成为读者了解和阅读图书时必不可少的助手与工具；而且还是沟通作者、编者和读者这三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成为这三者之间信息交流的助手和工具。因此，无论何人，从哪个角度去写书评，都必须将图书与读者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图书与读者的双重需求去评价图书。让读者知道作者和出版者为什么要写作和出版这部书，这本书写了什么，怎么写的，有什么特点，好在哪里，读者为什么需要他，他在哪些方面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益等等。对于作者来说，要让他们

知道，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书，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书，他能给大众带来什么，会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益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对图书评价准确、到位的基础上，抓住读者，正确引导读者更好地掌握图书的内容实质，充分发挥书评的宣传功效。

图书信息在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交流的过程中，书评起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中介”作用。而在沟通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图书信息交流的“中介”过程中，出版者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和把握相关的市场动态，并根据读者、作者以及相关图书市场动态等综合信息，去策划和组织生产读者需要的，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

（二）书评的良好宣传效果在于内容与形式应当不拘一格多样化，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书评的内容和形式没有固定的模式。从内容看，书评可以是对图书内容、形式的全面分析、议论；也可以抓住图书的某些主要章节或某个主要方面进行重点剖析；还可以通过介绍选题策划、写作背景、编辑出版意图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指出其在同类图书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以及市场价值等。就形式而言，可以采取书信体、问答体、访谈录、论说文、辩论文、序与跋、编辑札记、作者手记、书话、随笔等多种形式。但是，无论书评的内容、形式怎样变化，都应当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都要牢牢抓住被评图书的核心内容来写，反映出图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基本面貌。这样才会使书评对被评图书起到积极的，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书与评彼此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当然，任何一篇书评，不论写得再好，对被评图书的议论和评价都存在局限性，甚至片面性。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防止内容与形式相脱离，造成片面和形而上学，从而游离主题与载体——被评图书及其主要内容，乱发感想与议论。那样只会增加书评宣传的负面效应。

（三）书评在发挥宣传功能方面，不是对图书做的简单的重复性描述，而是在评论、宣传过程中进行的再创作。所以，一篇好的书评，往往在对图书的介绍、议论和评述过程中，引发新的观点与见解，提出新的问题与思路。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就意味着对书评工作者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一方面，不论什么人进行书评创作，都应当选择在各个领域有代表性、有价值的，影响广泛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图书为评论对象；另一方面，要在联系读者、作者、出版者的基础上，对被评图书尽可能精读，对被评图书的学科知识广泛地了解，深入地研究，这样才能写出内容有价值、有份量的书评，

提高书评的文化与功能档次。

(四)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是书评宣传价值和生命力所在。评论一部书, 应当长短兼议, 评价客观、真实。同时还要注意在运用各种思维方式进行书评写作时, 力求做到语言生动、朴实, 表态小心, 谨慎。特别是书评的作者, 如果不是被评图书学科的专家或专业人事, 也不是被评图书的编辑, 非己学之所长, 就更要审慎行事, 避免可能凭一时之兴, 粗读所感, 浅尝辄止地解其文辞, 抽其意蕴, 而作妄谈。如此, 非但不能扬旗显阵, 评出内容特点, 精神实质, 反而迷衢失巷, 曲解书意, 有负作者, 有误读者。即便是被评图书学科的专家或专业人事, 或是被评图书的编辑, 也难免存在笔走偏颇, 评不达意之处。如果文章中再堆砌词藻, 术语连篇, 行文古怪、超前宣传、评价失实, 使读者感到上当受骗, 那么, 文章再好, 人们也不愿去读。图书和评论便丧失了其应有的生命意义和宣传价值。

(五) 一篇好的, 相对完整的书评, 不单是对被评图书的内容的议论和评价, 还应当包括对书的装帧设计和印制等方面的议论和评价, 对书的最基本的信息(要素), 即作者、字数、开本、出版者、出版版次印次和时间的介绍。这样, 书评的宣传功能和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才能到位。作为读者来说, 有时要了解和掌握一本书仅凭阅读书评的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寻源溯本, 由评觅书, 方可得到“真经”。倘若读者通过阅读书评, 进而对所评图书产生了兴趣, 希望能够得到这本书, 然而却不知该从何处去觅得时, 那真是一件让人着急的事儿。因此, 每一位书评的写作者, 包括编发者, 都应当想到书评的读者, 想到书评读者对被评图书的需求。所以在写作和编发书评时, 应当让读者知道有关被评图书的一些最基本的出版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于读者, 尤其是那些渴望购得印数很少, 发行范围又窄, 而专业性或学术性又很强的被评图书的读者来说, 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 应当高度重视和发挥书评宣传功能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图书评论这种重要的图书宣传方式, 将反映各个领域的优秀文化和科技成果的精品图书, 适时地介绍给广大读者, 将宝贵的精神财富, 转变成社会的物质力量, 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同时, 也不断推动书评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 新的课题和观点

——评《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在传统史学和当代史学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方面的著述丰厚，新课题的空间已经很小。奇秀先生在近年来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对机构改革这一热点问题做了史的考查，选择了在人事和行政制度史中既有历史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得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见解，写出了《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①（以下简称《体制》）一书。1993年，此书获得山东省第八届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体制》一书课题研究的重要见解及其意义

作者认为：“在中华民族众多的重大创造中，机构设置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项”，因为“机构设置在国家中处于重要的位置，……任何一个朝代开创伊始，都把在总结前代经验基础上，创立新制以垂典示范做为头等大事来抓。典章制度的厘革则与整个朝代相始终。而当历史转折关头到来的时候，总会出现重大改制。这样，我国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机构设置经验就特别丰富，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精华，剔除糟粕，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对我国当代的行政机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正是从这一研究思想出发，作者对我国历史上整个封建社会的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宰相设置、中央行政机构设置和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宰相设置的独任型、群任型和兼任型，中央行政机构设置三层型和二层型，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实二级型、一虚二实型和实三级型，构成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八项创造。”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构成中华古典

^① 盛奇秀著《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中国人事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八项创造”产生、形成、发展，以及演变的原因、结果、规律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对这八项创造的优劣，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启示”，做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了对今天可资借鉴的一些重要见解。例如，《体制》一书认为，“构成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八项创造”的本质特色和历史价值是：“最高决策机构实行群任型，最高行政长官实行独任型，最高决策机构的辅助部分——咨询组织实行兼任型；中央行政机构设置视最高行政长官设置与否，或实行三层型，或实行二层型；地方行政机构设置视行政区域大小和行政区划粗细的程度，或实行实二级型，或实行一虚二实型，或实行三级型”。另外，《体制》一书，还对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八项创造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指出，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足与中华古典考试制度（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此文作者注）相媲美。”“而它的历史意义则与我国古代科技领域中的‘四大发明’一样，曾为世界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这是首次从人类文化的角度，对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给予的评价。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其观点独出，立意高远。

多少年来，只要谈及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不是讲消极因素多，就是考查视野不够开阔。换一个角度看，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之所以内容丰富多彩，结构合理严谨，任凭朝代更替而适存不移，并为世界上一些古代国家所借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朝历代都有注重总结前代经验，调整机构设置，完善行政体制，提高管理科学性的做法和举措。这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并且认真地加以总结和研究。这对当前和今后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体制》一书，无疑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二）《体制》一书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的学术概念与观点

比如，《体制》一书将古典行政机构设置的时间上限，划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的建立；下限截止到公元 1911 年清朝灭亡。其中，又分为“兴起期”、“典型期”、“蜕变期”三个时期，跨了中国古代和中国近代，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然而，《体制》一书用了“古典”（或“皇朝”）这样一个词语概念，来表达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个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行政机构设置体制，既科学、到位，避免了由于历史分期而造成的，在结构和叙述上

的繁冗；又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中国古代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自身发展演变的阶段和线索，以及在分期上的特色。

再如，作者认为，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政治文化。因此《体制》一书还用了“中华”一词，强调我国历史上多民族对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发展、完善所作的贡献。正因如此，《体制》一书注意到由少数民族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朝代，和国家处于战乱分裂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中，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情况，以及历史上一些朝代的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行政管辖，和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有力维护。

作者为了讲清在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中，最重要而又变化最多的宰相制度，提出了宰相设置有“独任型”、“群任型”、“兼任型”的概念。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到过宰相设置中有“独相制”和“多相制”之分，但尚不如《体制》一书系统和完善。为了讲清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作者又创造了中央行政机构设置“三层型”、“二层型”，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实二级型”、“一虚二实型”和“实三级型”的概念。作者用这样一系列高度概括而又生动准确的学术概念，使得《体制》一书在对论点进行阐述或概括的时候，逻辑比较清晰，思路比较简捷明快，把如同一团乱麻的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理出了头绪。

（三）《体制》一书在专史体例上的特点

不少专题史学论著，因受历史分期的限制，一般都采用按朝代的时间顺序，进行编写的方法，其结果，总是去不掉通史的味道，专论的发挥，也受到一定限制。《体制》一书，打破了这一常规。他将秦朝到清朝（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这两千多年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的历史，按照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总说、宰相设置、皇朝中央行政机构设置、皇朝地方行政机构设置、论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五个专题”进行论述。每个专题下面，再分若干小的专题。各专题之间，既层次分明，相互区别，又主干清晰，内联紧密。对时间和空间跨度如此之大，历史史实如此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进行了高度概括，分类归纳，分别阐述。这样的专史学术著作，目前还是少有的。而作者大胆尝试，开拓驾御，取得成果。由此反映了作者扎实的学识功底和深厚的治学功力。

（四）《体制》一书重视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在《体制》一书中，作者指出，宰相设置的演变规律是“从独任型经群任型演变到兼任型”；中央行政机构设置的演变脉络是“从三层型向二层型演变”；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演变规律是“从实二级型经一虚二实型，演变到实三级型”。同时，作者还在《体制》一书中，用示意图的形式，对这些演变规律及其概念，进行了更加直观的演示和说明，使人们在阅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比较容易地透过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看到其规律性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在《体制》一书里，作者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地理环境等不同角度，对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进行了论证，并且通过这些论证，指出中华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对我国当今机构改革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由于《体制》一书受“旨在向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介绍我国皇朝行政机构设置体制知识”的约束，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在探讨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因而显得说服力有些不足。此外，作者对有些史料理解的准确程度，概念的严密性，以及从史料中归纳出结论的推理过程及其逻辑性等，还显得有些粗糙，有待进一步“打磨”。

（《光明日报》1995年11月12日；文章发表时，内容做了删减）

3. 填补译著空白的 《国家公务员制度》

自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我国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以来，干部人事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就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五年来，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及有关法规的制定，干部人事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具体的实施操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日文著作《国家公务员制度》^①一书的翻译出版，一方面，填补了目前国内在人事与行政管理工作和科研领域中，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外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译著空白；另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很好地借鉴外国国家人事和行政管理制度中科学、先进的理论与方法，为建立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服务。

那么，《国家公务员制度》书中的内容，对于当前我们在干部人事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领域中，正在推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哪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呢？

第一，《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完整地介绍外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译著。这部书的作者是已故日本国家人事院第一任总裁佐藤达夫先生。

佐藤达夫先生于1928年（日本昭和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经内务省进入法制局。曾先后担任过两届日本内阁的法制局局长，并且从1963年（昭和38年）到1974年（昭和49年）连续担任三届（长达12年的）日本国家人事院总裁，直至在任内因病去世。期间，他参与了日本国新宪法的起草拟定工作，并亲自主持制定了日本国家公务员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① [日] 佐藤达夫著《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令等。可以说，佐藤达夫先生是日本新国家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确立和施实的奠基人。正是这个缘故，佐藤达夫先生的这部著作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整体面貌，以及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沿革和实施的经验与成果。

《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从1975年9月（佐藤达夫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在日本首次出版，至今已经再版五次，并多次重印。在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一直保持着科学性和权威性，被誉为“有关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不朽之作”，成为日本国家公务员的培训教材，也是了解和研究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与沿革，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最佳著作。

第二，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全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公务员制度。比如，书中引用、例举出的有关国家公务员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就有20多种。其中，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最重要。它不仅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实施所依据的根本大法，而且还是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各项具体法律、法规的依据。这些法律和法规，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法制核心精神，以及法制体系的严谨，法律制度的完备，从而使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得到法制的切实保障。

第三，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国建立和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对国家行政机构实行科学化管理，提高政府行政工作的效率。而“国政的效率取决于从事管理国务的国家公务员是否有才能，是否公正，是否诚实勤奋。”而要使公务员“保证办事对国家既有民主又有效率”，首先，要采用公开考试的“民主方法”来选拔和录用公务人员，“达到吸引优秀的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其次，要“以法律为保证”，保障公务员在工资、保险、福利方面得到优惠待遇。同时，还要在工作中贯彻“成绩主义”标准。所谓“成绩主义”标准，就是要完全以个人才能的大小或工作实绩，作为公务员考核任用、职务升降的唯一标准。这是日本政府为了确保达到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目的，而在国家公务员的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第四，《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还指出了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中，两个比较突出的思想行为准则：第一，国家公务员必须保持中立性，这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最大特点”。因为国家公务人员“是全体国民的服务员，不是一部

分人的服务员。”第二，“国家公务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到国民的注视。因此，不论工作内外，必须注重廉洁，杜绝贪污行为。”为了防止国家公务人员结党营私，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办事效率低下和腐败现象的发生，日本国家公务员法不仅对在职的国家公务员，而且还对已经退職的国家公务员，在职务、权力、甚至私人交往方面都做了具体而严格的规定，不允许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形式的违法或违规行为。同时，还严厉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不得与任何具有经营盈利性质的单位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不得参与任何带有经营盈利性质的活动，否则将受到严厉的行政或刑事处罚。

第五，《国家公务员制度》一书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对日本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特点：首先，根据公务员法和工资法规定，日本国家公务员实行职务工资制度。这种职务工资由基本工资（工薪）和各种津贴组成。津贴中包括了公务员的住房、饮食、亲属抚养和子女教育等实际生活费用。这就使得公务员能够享受优厚的待遇。其次，日本国家公务员工资升薪调整。并且在对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一般家庭标准生活费用的提高和物价指数上涨等因素进行测算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公务员整个工资基数，以确保不降低公务员工资的绝对收入。

日本国家公务员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一整套法律和科学的管理体系，因此日本国家行政体制的运转，并不因经常出现的政局动荡和内阁人事更迭而受到波动和危害，这是日本社会经济、文化能够不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光明日报》1995年8月18日和《中国人事报》1998年5月22日先后摘要发表了此文）

4. 歌唱英雄的《共和国英模谱》

《共和国英模谱》^①是目前第一部专门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有代表性的杰出英雄模范人物的图书。这部书的内容有着很强的思想性、教育性和时代特点，对于今天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主题内容鲜明突出。“共和国英模谱”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点、丰富思想内容和精神内涵的题目。这个题目不单是这部书的名称，更是对全书内容高度概括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书名）下，汇聚了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到今天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英模人物，记叙了他们感人的先进事迹；突出了不论共和国哪个历史时期的英模人物，都是那个时代崇高精神的代表，都为那个时代高尚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注入新鲜血液，谱写了时代的主旋律。英雄模范人物创造的先进事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全书突显了这样一个主题内容，写出了共和国英模史，就写出了历史与现实的主旋律。

（二）思想教育的理想教材。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英雄人物”，共15人。除了麦贤得以外，其余14人都是烈士。例如，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向秀丽、王杰、安珂以及少年英雄赖宁等。第二部分为“模范人物”，共20人。这其中有的人物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例如，时传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苏宁等。我在读这本书时常常想，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上不断升温的“怀旧热”中，英雄模范人物是人们怀念的重要对象。为什么人们是那样地怀念和呼唤他们？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为什么是那样的鲜活，高大？因为不论哪个时代，哪方面的英模人物，在他们的情感 and 精神内涵中都有一种共性的东西，这就是对共产主

^① 本书编写组编《共和国英模谱》，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